

程天固 著

第三輯

③

程天固回憶錄

(下)



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目

次

下 冊

第十六章	勸胡漢民出國并一起放洋	二六九
第十七章	遊俄觀感	二八五
第十八章	主持實業部時期	三〇五
第十九章	南洋視察	三二一
第二十章	歐洲視察	三六九
第廿一章	南中美視察	三九九
第廿二章	抗戰中的外交生活	四三九
第廿三章	中華民國革命的檢討與展望	四八一
第廿四章	建國中之幾個基本建設條件	四九五

曰：「前途大勢，確屬可慮，誠如汝言；但今非其時，如我一出，必立與武人正面衝突，發生惡感，反滋不美；且中央方面，必起疑慮，以爲我有盤據地方，以抗中央之野心，很容易滋生物議。」胡氏對出處考慮之周詳，於此可見一斑，是以我之建議，終不果行。越數月，陳濟棠之勢益張，海、空兩軍，本皆設總司令，各自獨立，與陳氏陸軍平行，至時已由陳氏強迫解散，改隸於集團軍總司令之下，空、海兩軍僅設司令，集海、陸、空三軍之權於一己，挾以自重，睥睨中央，對於中央政令，如於已有利者，則表示服從；於己不利者，則假託胡氏之意旨，拒不受命，胡氏在京之友好及同志，咸爲胡氏抱不平，常有電報密告，此中內情，胡氏明知爲人利用，亦無可奈何，只有忍氣吞聲而已。

宋子文當時長財政，深知此中內幕，曾對其親信某粵人云：「廣東一班人中，最聰明者是陳濟棠，最蠢者是胡漢民，」即指此也。我見胡氏處此環境，實表同情，察其日常言談，每有難言之隱，而於衝動時，則大發牢騷，左右之人，知其心中抑鬱，只能從旁婉詞勸慰，然亦於事無補也。一日清晨，我們用畢早餐，散步至屋前草場閒談，我輕輕地向他提出一點意見，略說：「今各方實力，在桂省有李、白之第四集團軍，在閩有蔣、蔡之十九路軍，在粵有陳之第一集團軍，鼎足而三，陳濟棠對我公，雖貌合神離，閩桂皆尊仰我公者，爲鞏固西南及貫徹主張計，我有一個小計劃，未審能行否？計劃是先由公分赴閩、桂撫慰兩軍，彼輩久失政治領導，得公蒞止，必皆歡欣擁戴，然後趨赴廣州，正式就任西南政務委員會主席之職，收拾廢墜，整齊西南抗日步伐，對於大局，料有可爲。陳氏雖桀驁，但顧慮腹背受敵，及人民抗日之熱烈情

緒，料他不敢爲陳炯明第二。公赴省後，自可向各人曉以大義，融洽各方，使西南團結，以促中央爲抗日之覺悟，則大局前途，尙有希望也。」胡氏聞了這話後，慨然曰：「粵省今日情勢，不同陳炯明時代，爾時總理握有海軍實力，足輔其發號施令，我今絕無足託肝膽之兵力，隻身入粵，徒供陳濟棠挾以自重，誠恐易進難退耳。」他所說不無理由，我只得聽之，未可強辯，更未敢強之採納。後來胡氏出洋回國入粵時之遭遇，確足以證明當日他雖入粵，亦無可爲也。

我在港住了一年，每思北遊考察，胡氏極表贊同，且囑於考察中，留意北方抗日情緒如何，並有無軍事抗日之準備。我自港先赴華北，而轉入長江一帶，考察數月，所見華北一般人民，抗日情緒之旺盛，不下於南人；而令我感到興奮者，乃查得中央蔣氏暗中確有種種積極的準備，以作抗日之佈置。我向軍事當局探訪時，還有人對我報告蔣氏自江西剿匪以來，已進行這項準備，當時乃借剿匪爲名，以掩護其抗日軍事準備，以免招日人之忌，並曾僱用許多德、義軍事顧問，爲之策畫，此項軍事準備，絕對秘密，蓋恐走漏消息，引起日人注意也。據所報告，至屬實情，當時因知國內漢奸之作日本偵探者至多，即非漢奸，而國人之不知國防輕重，不能守秘密者，亦大不乏人，其諱莫如深，固所應爾。其後抗戰，記得汪氏在重慶，有人向他問及軍事計畫情形如何時，他每發牢騷曰：「你要問我，不如問你自己，我雖是一個行政首要，但軍事當局視我正如外人，一概皆守秘密，故此一概軍事計畫，連我也不知道一點消息。」汪氏之牢騷，固有其發洩之理由，但蔣氏對於軍事計畫，嚴守秘密之主旨，亦殊不可厚非；否則，如汪氏其人者，所有軍事計畫爲彼盡知，豈非貽誤國家於無窮耶？蔣氏於抗日以前，所作種種準

備，其苦心孤詣，實有可取；我由各處悉心觀察，如各項國防建設之秘密積極推進，確屬事實，其用心之苦，實應令人諒解而增加佩服的（後來我回粵，則以上述所見事實告胡氏）。

當我行抵華北，本欲再往東北一行，忽接胡氏電促南返，我乃回港。我初以為粵中實力派或已有覺悟，而能與胡氏推誠合作，共謀國事。不料返抵粵中，所見局面，一仍其舊，軍人對胡，仍然陽奉陰違，與前同一失望。而胡氏電促我回粵，是因王寵惠氏自海牙歸國，寧方派他回粵向胡幹旋，請他入京。王氏與胡氏私交至篤，推崇備至。他常對人言，自總理逝世後，他最佩服推崇的，只是胡氏一人；我曾閱過他給予胡氏私函，亦曾有過這項向胡氏推戴的話，並稱自孫總理逝世後，惟有胡氏一人能配為領導者。這是王氏肺腑之言。由胡氏在湯山被禁時，王氏即棄職赴歐，以示不滿一點觀之，可見他對胡氏之同情心為何如了。所以王氏自海牙歸國，寧方便派他向胡氏幹旋，非無用意也。胡氏促我回粵，原來就是因他之蒞止，要我和他陪同磋商一切，如有頭緒，也許派我陪同王氏晉京覆命，此及胡氏著我回粵之意。不過我知蔣氏此舉，不會打動胡氏的，胡氏為無故被禁，要蔣氏公開向他道歉，始有商談合作之餘地；而蔣氏個性之倔強，比之胡氏有過之而無不及，豈肯低首下心，勉強接受？故結果雙方無法接近，自在意中。蔣氏幽禁胡氏之孟浪舉動，其本人事後，有無懊悔，不得而知；然準備抗日，非先統一中國不可，這是蔣氏所熟知的，而統一中國，非與西南省首要胡氏合作又不可，這又為蔣氏所熟知的，故派王氏專誠敦請胡氏入京，共商國事，自有其苦衷。胡氏即不願回粵，又不肯晉京，長此在港滯留，殊屬非計，不獨環境不宜，接近國門，諸多刺激，於健康更有妨礙。我乃與王

氏密商，爲胡氏計議行止，我提議勸他暫離海隅，放洋考察，一換空氣，以候時機，並測驗蔣氏有何進一步的表示，且可藉此機會在外國延聘專家調理舊病，實一舉兩得。王氏極聽吾說，並云倘胡氏果真出洋一轉空氣，他個人稍後定必追隨。我乃直接向胡氏獻議，胡氏即表示嘉納，遂決定照此進行。粵中各元老亦大爲贊成，即向西南政務委員會籌得資斧十萬元，乘輪赴歐。同行者，除胡氏必要我個人追隨外，還有他之女公子木蘭，並一醫生，一女看護。所有一切旅費及種種開銷，概由胡小姐個人經理，我個人除船票外，所有旅費及一切費用，則聲明自理。

我們一行，先抵德國以調治血壓高病，在著之畢腦咸溫泉小城小住。胡氏本有血壓高病，在城住了未及一月，延醫調治，已由二百餘度，降低至普通正常高度。他的健康和精神，大有增進，而恢復常態了。自此，我們轉遊法、荷等國，未幾，王氏亦隨之而到。我因他既有王氏作伴，遂乘機前往蘇俄考察。蓋我之認識蘇俄，乃從書本和報紙上所得，終有隔霧看花之感。蘇俄不獨與我國發生密切關係，且爲舉世矚目之一個革命國家，我想實地考察之願望，蓄之已久，今抵歐有此機會，何可錯過？胡氏對我之志願，亦極贊成，並囑我到俄時，探討該國政府意見，對於我國萬一與日本交戰所採之政策爲如何？我由歐乘國際火車直達蘇俄邊境，此乃民國二十四年冬。入境時，關員尙屬客氣，並無如何盤問檢查，只問我來俄考察幾日離境，我答以二、三星期爲限，我手攜幾本美國雜誌、英文遊俄指南及俄國歷史各一冊，關員亦不過問，只微笑點頭了之。俄國最忌外國雜誌，以爲必被關員檢收，今乃得以放行，殊出意料之外。車抵俄京，即由旅行社送至俄京著名大旅館密地佈（Petropole）寄寓。翌早則赴我國駐俄大使館

拜訪。那時的大使是顏惠慶先生，是我國外交界老前輩，頗負時譽，爲人和藹可親，儀表甚佳。他是我國與蘇俄復交後，首一任大使，對於駐國情形，甚肯研究，且在駐俄外交團中，交遊頗廣，是以我到俄之後，得他和大使館幫助甚多。由使館之介紹，除了擬見人物擔任設法介紹外，所有其他參觀節目，皆由蘇俄文化館在二個星期內，代我分配時間，擬定行程，依時遊覽參觀，並介紹一位譯員，伴隨傳譯。除了前往俄舊京列寧格勒遊覽二天、俄新京莫斯科附近小鄉鎮一天外，餘均住俄京。遊俄時間雖短促，所遊地方亦不多，就考察所及，亦有足述者，當於另章——遊俄觀感詳之。

我由蘇回歐未久，蔣氏也許知道國際形勢快變中、日啓釁，無可避免，所謂忍到無可忍之時快要來臨，故他急欲統一內部，以備共赴國難，詎料汪氏不先不後，正於此時因被刺風潮發生，避居青島，中樞裂痕，又死灰復燃了。蔣氏正於此時，即派王氏親信魏道明先生趕程來歐，除慰問胡氏外，並表示極願與胡氏合作，請即回國共主國政。魏對胡強調說：「此來敦請，確出於蔣氏至誠，萬望接納。」胡氏成見甚深，能度強硬，且對於蔣氏過去之加以幽禁，尚有微詞，每次討論到其個人出處的實際問題，則緘默不談，表示冷淡。後經王、魏兩氏力言，國勢危急至此，爲大局計，蔣、胡合作，不容遲緩，他乃轉囑我儘管與魏氏商談。我乃請他給我商談範圍及意旨，他總是沒有表示，但他始終是以抗日爲主旨，這是大家知道的；蔣氏之歡迎合作，亦即表示接納胡氏之抗日主張，關於此點，胡氏也會意蔣氏之用心；不過講到合作條件，這是政治上現實問題，即合作的雙方責任問題，故此除雙方同意於抗日救國大前提外，便須談

到胡氏個人復出的地位問題了。惟我每向他請示時，這位先生搖頭不答，默然緘口，一似可任由我個人負責商議擺佈便可了事似的；這種態度，豈是我國政治領袖與人無爭之表示耶？抑亦國之禮讓爲國之舊道德也。我德學輕微，個性懸直，無論追隨長者，或服役長官，自問絕無徇私諂媚，阿諛奉承之所爲，遇有不稱己意者，反常向之申辯力諍，即使因此割席棄職，在所不惜。惟胡先生道德、文章，世所罕見，公忠爲國，大義凜然，人所共仰，今以此合作商議重責，付我一人身上，敢不毅然從命？盡忠竭智以赴之？不過以先生對於個人出山條件，絕無表示，未免太過冷靜，致使代言者有點困苦，無從揣摩，萬一處置失當豈非誤國誤友麼？幸我雖沒有做過他之部屬，但常以清客和同志關係的地位，每於私人傾談中，多能推心置腹，沒有客氣存於其間，因此領益至多，即他的政治理解和個人志向，亦知之較深也。

以黨治國，是胡氏一貫的信念，黨權高於政權，又是他一貫的主張，故對黨政兩權合一，反對最力。他之主張未能實現，就因爲向來黨中有黨，內部份子，壁壘森嚴，多數份子，都爲大力者把持操縱，自己孤掌難鳴，所抱主張，無由通過，此爲他最感遺憾之事。他認爲政治之腐化，實由於此黨政合一之毛病所致，故非徹底改革，截然割分不可。惟有提高黨權，用以指導監督政治，則政黨的威信可保，政治之澄清可期，此乃他素來之抱負，並常以此認爲他個人應負改革之責任。我知他之素志如此，故於奉命商討合作條件時，膽敢貿然先以此向蔣氏代表魏道明提出，並囑他先向蔣氏磋商。那時中央黨部正決定開四中全會，且候胡氏有何議案提出。此會之開，當然爲胡氏回國合作之轉捩點，同時用此機構，以表示中央請他回國之誠意，故中

央之不失不後，決於此時開會，確有善意的作用。然我之向蔣氏代表提出此黨政的改革方案，也有其連帶的作用，除了想試探蔣氏對胡氏之改革意見反應如何外，還要知道合作中，胡氏在黨的地位爲何如。我還向蔣氏代表說：「倘胡先生在黨的地位得到解決，其他一切問題，便可迎刃而解。蓋胡氏對於政治方面的權能和用人等問題，向來與人無爭，只要其人能以黨的意思爲依歸，以求政治主張，有人負責，認真去幹便可；他現在主張以抗日救國，爲唯一主旨，故一切政治措施，應以軍事之準備爲至要，而負此責任者，也早已認定非蔣氏莫屬；黨與軍之責，各有攸歸，其他問題，自易商量。我信黨、軍分負責任一點，爲蔣、胡歸好之先決問題，不得不先向蔣氏說明，並須得其同意之確實表示。」魏氏立即去電請示，翌日，得蔣氏覆電贊成，跟著四中全會正在開會期間，亦以大會名義來電，報稱全會已正式通過胡氏爲國民黨主席，蔣爲副座。吾書至此，另有一別饒記述價值之事發生，即於我們接獲全會電訊之前夕，日本新聞界已先我們而得此消息，時我們一行，已移居荷蘭，忽得柏林轉來長途電話，我接聽之下，始知發電者自稱東京某大日報專訪，他向我報告胡氏膺選主席之喜訊，竟詢及胡氏何日返國就職云云，此可知日人對胡氏之注意，而胡氏之出處，牽涉中日關係之大，亦可見了。

我此次爲胡公考慮其出處，頗費躊躇，蓋以胡年事日高，而體復多病，不能如前之勝任繁劇；惟其地位，又必須得到相當崇高，乃符身份。我此次膽敢於胡氏緘默中，提出黨部主席之條件，未始非冒昧所爲，幸他在接到黨部給他膺選消息時，面有悅色，且對我肆意向對方提出條件，並無加以孟浪之責，我自此便知合作條件，已妥協過半矣。未幾，又接蔣氏及黨部急電，

促即返國領導一切，並稱其他政治問題，候胡回國後，即可從長計議云云。胡氏對此，仍無表示，復電乃由魏氏與我簽擬，我知胡氏已有接納之意，蓋他對於中樞改組，及人才物色等準備，已常與王氏及我們討論到。胡氏心目中，擬於改組實現時，行政院長一席，以均得蔣、胡二氏信任者任之，人選以王氏爲最適當，蓋王氏亦爲蔣氏所器重者。外交部長一席，由院長兼之，但王氏堅持不可，當時有轉商胡氏，曷不以銜命來歐之魏氏任之？魏氏乃留法法學博士，曾一度任過司法部長，辦事頗細，他乃王氏親信，得蔣氏信任，委用此人，便與王氏兼任無異，惟於轉商王氏時，王氏則力薦駐俄大使顏惠慶，胡氏乃囑我電邀顏氏到商，及顏至，他先來會我，提出問題二點：(1)外交全用專門人才；(2)取消黨治，使全國各黨各派團結一致，全面抗日。我不客氣對他說：「對胡先生，切不可提及第二點，胡公是黨中領袖，如提及取消黨治，將置胡氏於何地？況中國不抗戰則已，若要抗日，深信全國人民，必起而響應，政府方面，斷斷不能故步自封，只用黨人，其勢不得不大開門戶，廣攬全國人才，共赴國難，屆時全國賢者，都沒有不歡迎參加，這不就是全面抗日之陣營嗎？至於第一點，任用外交專門人才，他必贊同無疑，不過我國外交人才，早已破產，臨急訓練，也訓練不來，只可由先生負責，盡量物色，並引用有爲之青年，未始非無辦法，故此關於任用外交專門人才一事，先生若肯擔任部長之職，自己便有用人權衡，是則此點似又用不著向胡氏多提了。」顏氏頗隨吾說，他與胡氏晤言時，並未談及此二點，祇高談今後外交政策和方針問題而已。彼此談話，甚爲融洽，顏氏深得胡氏器重。胡氏之推重王、顏二氏，絕無私意存乎其間，故他料蔣氏必定贊同。自此，他個人對於國家抗

日前途，極感興奮，終日與我們健談國事，滔滔不絕，並無倦容，精神煥發，病態消除了。

有一日，我們大家坐談時，我曾問他對於黨的組織和內部的改革如何？有否考慮過？他答道：「過去黨政混一，界線不分，負責政治者，多兼黨方委員，故其流弊至多，往往使政治權力，駕乎黨權之上。彼忙於政務者，即使是熱心同志亦無暇兼顧黨務，其他掛名黨籍之從事獵取政治權者，更無愛黨之心，於是黨治鬆弛，失其效能，政治也隨之腐化，故此黨政一定要劃分，實行以黨監政之辦法。」胡先生以黨監政之主張，確屬求治之根本辦法，不過一個黨最重要的要有紀律，若其本身漫無紀律，黨員復無嚴格之訓練，要其監政得當，也非易事。國民黨組織，近年日趨腐化鬆弛，暮氣沈沈，黨員複雜，良莠不齊，加以內部糾紛頻仍，派別叢生，黨中統一意志，既感缺乏，應時改革之精神，復幾等於零，試問此種不健全之黨，何能監政？何能督責其不為政治所支配？而得到黨政混一之現象，已屬幸事矣！國民黨之不知改革，以致失敗，良有以也！一黨之健全，全靠黨員之具有堅強的信念和充份的訓練，世界上凡百政黨的組織，皆賴此以維持於不墜，否則只有聽其自然之淘汰而已。我曾擔任過一次短期間的市黨部訓練部長，深知濫收黨員，重量不重質之毛病，其影響於黨之紀律至大。所見申請入黨者，良莠不齊，其莠者，藉此以圖私利或報私仇者，比比皆是；其中良善者，其知識程度，也有低至無可比擬者。有一次，我曾親自審查數十個申請入黨之人，有答其入黨目的，是因左鄰之新開棺材店，自開張以來，影響他之生意甚大，因顧客一見棺木店，均認為不利，而裹足不進，故欲入黨後，藉以設法驅逐之；又有答以為仇人壓迫，非入黨籍，無以報復；甚至問及早經逝世

之國民黨總理現在何處，竟答以尙居北平；以這種人入黨，若不徹底加以訓練，其不敗壞紀律者幾希。然以一個忙於政務的人，除非他有驚人之魄力，有長過二十四小時一日的時間，否則則是絕對無法兼顧的。這是我短期間辦黨的經驗，由政兼黨，毫無是處；況我又是不懂得訓練的人，嘗試了兩三個月，只有辭而不幹而已。由此可見胡先生之見解，確是不錯，黨政劃分，而以黨監政，固屬要圖，但黨權提高，而不先黨之健全，也是無用呢。

國民黨應該大大改革的地方還多，如國家養黨，和黨員兼職而兼薪等，皆是不合道理的，這是我個人時常發言反對的。黨應該由黨人自養，始能保持其自由獨立之精神；黨員兼職而兼薪，實有乖官常，而啓貪污之漸；皆應在革除之列。同志中不少明達之士，大聲疾呼，提倡改革，但仍未能召致黨權當局之同情反應，以致陋習牢守如故。我個人對此，更感人微言輕，不足有爲，只有自行其是，凡黨中酬俸，未敢領受，所以中央黨部之中央委員薪水，十多年未嘗支過分文，即在政務方面，凡所兼職，亦不兼薪，並非自鳴高潔，實覺受之有愧，而有背個人信念也。總之，國民黨應當徹底改革之事至多，今胡先生膺選爲主席，所有應行改革事宜，都落在他一人身上，此公素來熱心黨務，不肯後人，且渠責任心至重，凡事多不肯假手於人，惟一黨之大，從新組織容易，從舊改革反爲困難。平常公務，已屬紛繁，再加以徹底改革的工作，深恐非抱病纏綿的胡氏所可耐勞的。故我有一日向他提議，要從主席辦公室內部的組織改革做起，其目的就要想減輕主席辦公之勞苦。其法略採外國政黨組織辦法，採分工合作原則，以綜持一切，在主席下設總秘書長四人，一長總務，包括庶務和人事在內；一長文電機要；一長黨

務，一長政治、外交。凡屬主席職務者，由所屬秘書長擬議簽呈劃行，以免各事集於一身之煩。四者之中，當然以司黨務之秘書長爲最重要。後來還向胡氏略有談及人選問題，問以蕭佛成或謝持二同志中擇一承乏如何？否則以何人爲最適合？胡氏立即接言：「你的建議，殊屬不錯，蕭、謝二氏，實本黨不可多得之忠實同志，惜一則言語不合中州，一則向來怕事，對行政事務，又絕不感興趣，以言此席人選，不若子超（林森先生）爲宜。」我聞此，知胡氏對我提議，頗有同情之感，因胡氏年事日高，身體復弱，恐各事集於一身，則有不勝繁劇之苦也。

魏氏自銜蔣命來歐數月，曾與蔣通電數十次之多，惟胡氏始終沒有直接與蔣通電，其有必需時，只由我加名而已。胡氏新任務經四中全會通過確定後，我們知道蔣、胡合作，國家統一，行將實現，魏氏即先返寧，向蔣覆命。胡氏被選爲主席之消息公佈後，財政部長孔祥熙即匯發胡氏返國旅費五萬大洋，敦促東歸，胡氏表示決不接受此款。屢囑即將原款匯返南京，此款結果如何，不得而知，因凡財務事宜，我絕不過問，概由胡氏女公子經手也。

我們到歐以來，所接國內各方情報頗多，粵中情況如何，胡氏也有所知，無道軍人作風，依然不變，胡氏亦深深了解，故於著我去定船位時，亦以到上海爲止。我本欲向胡氏提議改由美國返國，美洲同志和黨部亦有電訊敦請胡氏到美國一行。美國華僑情況，與歐洲的大不相同，彼邦僑胞，對於國事極抱熱誠，以胡氏之德高望重，必爲僑胞熱烈歡迎，自不待言。我往年曾與許崇智先生和鄒魯先生等同遊美洲，深知各團體鄉情之熱列爲何如。美洲各埠華僑，各種團體林立，大城市中，有數十個，小城市亦有十餘個，而國民黨分部，無論大小城市，都有分設，

他們情誼極厚，若受某一團體之歡迎而卻其他，則有傷情感而發生非議；每一團體開會，離不開三齣頭之儀節：一、演說，二、拍照，三、宴會，此三齣頭之完成，至少需要半日時間。許、鄒等當時遊美，本擬在美居留一個月，但留了三個多月，還幾乎不能脫身，其麻煩勞頓如何？可想而知。此類應酬，終非胡氏體力所能抵受，且又為時間所不許，雖胡氏常以未到美洲為憾，且經美轉輪回國，可直達上海，免再經港、粵，而惹起刺激，甚至不良之影響，我對此點深深的考慮過，然我終未敢獻議，只由他自己決定行程，且他本人亦曾發表過意見，謂如決意回國，則愈早愈佳云云。因此，關於路程，只有秉承他的意旨，向法國郵船購買直達上海之船票。船位已定妥，數日內便要啓程。不料一日早上，不知他對於回國事有何反感，一似尚有躊躇之態，忽然對我說：「蔣氏雖急欲我返國，但他之誠意到底如何？未可預測。」我還未到他說畢，便插口答曰：「蔣氏誠意如何？似不宜多所計較，公既知中日戰爭不久便要爆發，至時局面當有大變化，而集中人力抵禦外侮，惟公是賴。今茲返國，正合時機。且政治家風度，只問出身能否福國利用，至於個人利害，詎暇計及？」胡氏聞之，頗為動容，他微笑地向我開玩笑曰：「你也來向我講這一套！」他遂停口沒有下文。

胡氏決計東歸，先到上海體察情形，然後入京。聞蔣氏亦擬於胡氏抵滬時，向其作禮貌的訪晤。我們一行，乃登輪離法，直駛向星洲去，此乃民廿五年春初也。抵星洲時，該埠華僑登輪訪問叩見，川流不息。粵方代表來星迎迓者，亦有十數人之多，中以陳濟棠之代表林某，和蕭佛成、鄧澤如之代表李某二人為最奇特。據胡氏對我說，他先後見了這兩位代表，一則說：

「陳總司令敦請胡先生回粵，千萬不可入京。」其他則說：「粵局絕無希望，請胡先生不要回粵。」我聽了胡氏的話，也感滑稽之極。不過人之立論，每因其環境及切身利害之不同，而有區別，本不足奇；蕭、鄧爲胡氏數十年莫逆之交，且是最佩服胡氏之人，所說皆由衷之言，固無任何私人利害存乎其間，故至可信；其他所言，有何作用？胡氏聰明，自能了解，無庸費詞解釋，故我聞之，只一笑置之而已。及船抵香港時，海面燃鞭炮，前來歡迎之小輪，有數十艘之多，立於海傍者，人山人海，港中各社團之代表延請胡氏登陸指導者，不知凡幾，其熱鬧情形，無可比擬，足見國人愛戴胡氏之深，和國人期望早日統一，共赴國難之切。胡氏不由自主，乃棄輪登岸，並擬改船赴滬。登陸之翌日，則赴由香港總商會召集之各界歡迎大會。西南各方軍政當局，固紛紛來港表示歡迎，在極短時間，胡氏便被這班人重重包圍，堅請返穗一行，但此時胡氏不即返粵之志尙堅，我亦從旁力勸胡氏勿忘蕭、鄧兩老之言，而爲彼輩所誤。不料，到了翌晨五時，他忽隔房呼我，我從夢中驚起，他肅然的對我說：「粵省乃鄉井之地，今過門而不入，人將謂我何？且不知者，反譏我怙於武人權勢也，我今決意一行，勞你同行，以二、三日爲限，我正不妨身入虎穴，曉以大義，事畢則返，決不留滯。」他語時，意甚堅決，而粵方迎胡之軍艦，此時已抵港，我以無可復阻，祇允隨行，但對胡言，須守三日之約，至期如不返港，我當獨去。及抵廣州，我知情勢不好。他寓於東山私宅，軍事當局派來大隊衛兵，藉保護之名，重重包圍水洩不通。我見此情形，不便與胡氏同居，自返河南私宅。每日只往晤面，打聽消息。每次走唔，皆見滿座軍政人員，無從私議，及三日期滿，胡氏仍無赴港動靜，我知

其一時必難離粵，於第四日之翌早，我遂作最後一次促駕，他知我來意，我一入門，便邀我入臥室，密談畢，我便離穗赴港。別時，他再三囑我，如我赴港，須等候亮疇兄日間自歐抵港時，一齊赴滬爲宜，並囑我二人可在滬等候他來云云。那時蔣氏已知胡氏赴粵，即派魏道明代表趕程南下，抵港時，先來見我，打聽消息，然後上省見胡。他返港時語我曰：「胡公已入牢籠，將無以自脫矣！」不數日，王氏抵港，因他曾與胡氏約定，先後回國，至多不能相隔半個月之久。我接船時，他便嘆惜說：「大事去矣！我在途中一聞胡氏返粵消息，知事無可爲矣！」我遂與王氏同往上海，臨行時，曾作長函一通給友人，請將信中意見，轉告軍事當局，以作最後之勸告。函中略謂：「兄等如欲維持及鞏固西南局勢於不墜，只有放胡入寧，否則恐有同歸於盡之虞。」

我與王氏到了上海，未入南京，在當局租賃備作胡氏抵滬行轅之高思路某大廈暫寓，以候胡來。一日，我聞上海聞人杜月笙先生想見我，我遂僱車前往相見，他一見面，便緊執我手，說：「聞胡生生不日便來上海入京，中國前途，大有希望了，請兄代轉胡先生，於他入京時，我們至少有數萬人歡送他入京的。」由此可見國人渴望胡氏之來，其殷切爲何如了。時已逾月，我忽接粵中密電，稍胡氏囑我即日回港，因胡氏擬日間前往中山縣遊覽總理故鄉云云，我接電雀躍萬分，知胡氏已有擺脫之計，必藉總理故鄉之遊，而直轉澳門。蓋總理故鄉翠亨村與澳門相隔不遠，只二十分鐘汽車便可抵達矣。但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，當我尚在打聽船期中，忽又接粵電，驚悉胡氏竟於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九日暴卒於羊城之噩耗，哀痛何極！胡氏德高望重，

功在黨國人所共知，私人操守，毫無瑕疵，所有聲色貨利，概無沾染，配稱完人，爲人厚道深情，待人以誠，聰明絕頂，料事如神，故時人有稱之爲智囊者。際茲國難當前，方謀大家合作統一局面之完成，以作對外之準備，時機最關重要，胡氏之進退行止，自非僅爲個人出處問題，可同日語，且渠久懷抗日宏願，深謀遠慮，興亡所繫，影響極巨，使能依計入京，則全國統一局面，早已實現，安內攘外之基礎，亦早奠定。在黨政方面，以此公之正直無私的精神，敢言敢爲之勇氣，出而領導，相信必可提高國人對黨之信仰，不致衰頹至此。官常吏治，不致腐敗至此。不幸公干慮只此一失，便告殞落，誠國家之大損失矣！他若能接受各同志之勸告，而不爲小軍閥所愚弄，逕趨南京而不入粵，中央得渠領導一切，籌畫禦外，必更神速，胡氏個人，或亦不致憂鬱不起也！然胡氏不死於明禁湯山之時，而竟死於軟禁廣州之日，豈非奇異？先後所遭，其同者則均爲槍桿下導演之悲劇，悠悠蒼天，孰令致之！軍人之橫恣妄爲，殊堪痛恨矣！

我對胡氏之死，深受刺激，頗有退處遠行之意，但在滬各方推我主持胡氏喪事，以此淹留月餘，始買舟返里。當在滬商會爲胡氏開追悼大會，一連數日，各界人士赴會追悼者，約三四萬人，尤以學界爲多，胡氏令人追念致悼之深，亦可概見。胡氏逝世後，西南局面，開始動搖，不數月，小軍閥之反動勢力，便告瓦解，中國自是完成統一，抗日大戰亦旋踵爆發。古今中外各國，未有不統一而能戰勝強鄰者！蔣氏事先雖有無故禁胡之孟浪行爲，惟後來屢次敦請胡氏入京合作，足知不無覺悟之處，其所以如此者，誠知須先統一而後能抗日，眼光度量，均比地方上之小軍閥遠大多矣。